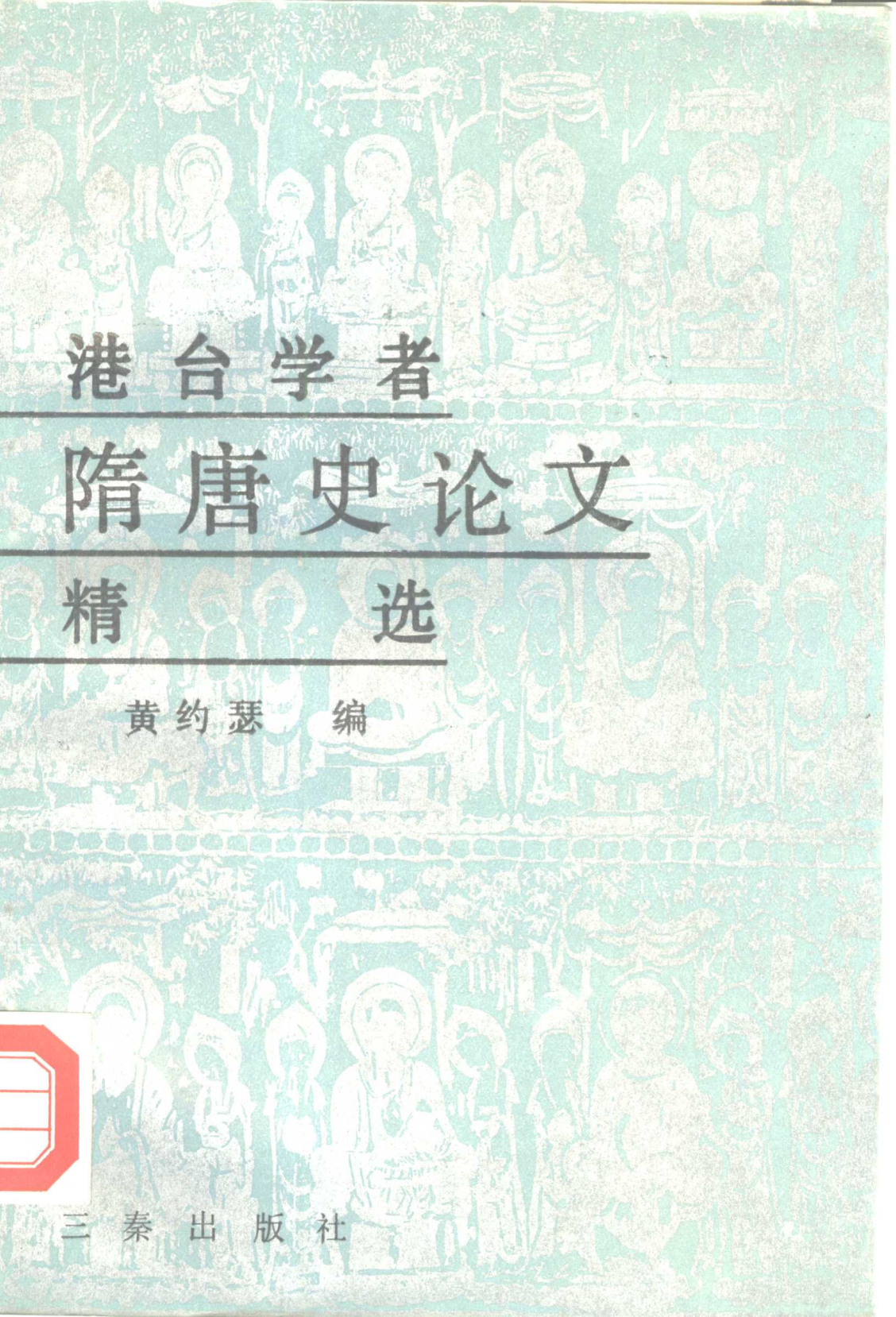




港台學者

隋唐史論文

精選

黃約瑟 編



三秦出版社

港台學者

隋唐史論文

精 選

黃約瑟 編

三秦出版社

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

黄约瑟 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
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546-176-7/K·68

定价：2.80元

战后台湾香港

隋唐五代史研究散记 —— 代序

近年大陆各方面的开放，令不少学者放眼世界，历史工作者尤其关心台湾、香港两地的研究情况，究竟两地的研究者，用什么指导思想做学问，他们掌握了什么新方法，发掘了什么新问题，有什么特色？诸如此类，往往是台、港学人访问大陆时的话题，本书的编选，并无意亦无法完满解答上述问题，只不过希望大陆上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者，能够通过本书所收论文，管窥两地同行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些成果，提供一些以为参考的材料，或许亦可藉此以为彼此间将来更多的交流作出基础。

本书收了九篇论文，作者中分别在国立台湾大学和香港大学授隋唐史的傅乐成和罗香林先生先后作古；历任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的严耕望、出身新亚书院后来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孙国栋和长期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学的李树桐三先生亦相继退离教研职务，但仍不时发表论著；其余罗香林先生高足、前任职香港大学、现任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林天蔚先生专治宋史，毕业新亚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曾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任职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曹仕邦先生精治佛教史，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毛汉光先生的研究范围，亦以六朝为起点，故目前单以隋唐五代为专业活跃史坛的，其实只有前任职香港大学、现任教台湾东吴大学的章群先生，由他们的经历和背景可以看到，本书作者主要是战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其中第一代多在战前在大陆受教育，而他们培育出来的第二代学者，亦多少承袭了他们的学风，换言之，如

果说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蓬勃时期，则遗风和影响，可说仍部分见于台港的学者中。

九篇论文的撰写年代分别从六十到八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专论极少，自然与时代背景有关：高等教育仍未发达，研究者数量极少，专门杂志亦如凤毛麟角，但情形至六十年代开始改观，随着社会的安定，大专教育的推广，研究者的数目和有关刊物亦相应增加，不过收入本书论文的杂志中亦有部份已经停刊，可见文化学术出版在现代商业社会立足不无一定困难，但不论殖民地的香港又或偏安一方的台湾，政治都少有卷入历史教研工作，历史教研，特别是多视为中古史的隋唐五代领域，并不易起直接服务社会的作用，历史工作者因此有相对的方便去从事本身的研究，在课题的选择上，研究者因此可说有颇大的自由，而一方面由于同行不多，研究同样对象的机会较少，大多数人亦下意识的去拓展新的领域，使所谓重复劳动的情形罕见，不过，由于研究者数目始终有限，能够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的机会并不多，彼此能够对话的场合亦罕见，故此，说他们在这片史学园地中默默耕耘并不为过。

本书所收论文，当然无法全面发表诸位先学的成就和治学特色，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傅乐成先生对隋唐的外族、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关心（见《汉唐史论集》自序），从《夷夏观念之演变》文可见一斑，林天蔚先生近年致力于地方史，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研究，《隋谯国夫人事迹》一文，即是他早年在这方面大量搜罗地方史料所作出的成果，严耕望先生早年专治制度史，后来又精研隋唐地理，《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可算是两方面的结合，章群先生考察唐代外族问题多年，心得可见《唐代的安、康两姓》。毛汉光先生以掌握大量史料探讨六朝至唐代的士族见称，《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亦反映了这种特色。有多篇专论唐代中央官制文章的孙国栋先生，主要用统计

方法，但在《从〈梦游录〉看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中，改以小说去印证他的研究，罗香林先生是研究唐代景教和岭南文化的先驱者，《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蛻父子不祀祖等关系》即为其中一例，李树桐先生对唐初史事有独到见解，《唐人喜爱牡丹考》却反映了他治唐史的另外一面，而从《〈旧唐书〉立僧传之暗示作用》不难看出，曹仕邦先生是少数能够从史学角度去考察中国佛教的研究者。

如果这些论文有共通的地方的话，那大概是它们是立足于史料之上。不过硬要把他们定名为史科学派，恐怕亦未必适当。因为无可否认，是各文大多有本身立论，不纯是停留和满足于史料排列的考据；而目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性质，仍然有不少需要细心整理功夫，始能提供大片的空白。各文的论点是否中肯，当然还得让时间考验和后人批评。但它们态度严谨，未有标榜任何学派，却不乏探索求真精神一点，实无容异议。有趣的一个现象自然是，台港两地虽然都是商业社会，史学工作者却少从经济史角度下手，反而较重视人文方面，与大陆地区的情形成为反对比。不必讳言，从今日看来，这些作品间中亦不无制约和缺点：新材料不易利用，实地考察难以进行，外国研究未能参考等，但考虑到时代限制，实在瑕不掩瑜。同时亦应注意的，是一些目前看来颇普遍及为不少人熟知的方法，例如计量史学，在本书所收的一些论文中的应用，在文章发表的年代，特别是在中古史领域中，其实是一种突破。事实上，尽管到今天，计量史学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虽然间中有人利用，但依然不一定十分成熟。

由于本书所收论文，重点在早年的学人论著，近年成果难免忽略。篇幅所限，这个任务只能日后再交代。史学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台、港史学亦难免例外，史学工作者肯定会同意，现在不可能与过去一刀截断。在这种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本书的

论文大概会有它们一定的价值。台湾和香港的史学研究在中国史学界，或只是一丝涓涓滴滴的支流，不过不应因此而忽视。实在相信和希望，本书不过是介绍台、港史学给大陆上同行，藉以彼此深入切磋交流的第一步。

黄约瑟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一九八九年九月

目 录

序·····	黄约瑟 (1)
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傅乐成 (5)
隋谯国夫人事迹质疑及其向化与影响·····	林天蔚 (17)
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	严耕望 (35)
唐代的安、康两姓·····	章 群 (43)
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	毛汉光 (55)
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	孙国栋 (89)
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蛻父子不祀祖等关系 ·····	罗香林 (106)
唐人喜爱牡丹考·····	李树桐 (120)
《旧唐书》立僧传之暗示作用·····	曹仕邦 (176)

战后台湾香港

隋唐五代史研究散记——代序

近年大陆各方面的开放，令不少学者放眼世界，历史工作者尤其关心台湾、香港两地的研究情况，究竟两地的研究者，用什么指导思想做学问，他们掌握了什么新方法，发掘了什么新问题，有什么特色？诸如此类，往往是台、港学人访问大陆时的话题，本书的编选，并无意亦无法完满解答上述问题，只不过希望大陆上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者，能够通过本书所收论文，管窥两地同行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些成果，提供一些以为参考的材料，或许亦可藉此以为彼此间将来更多的交流作出基础。

本书收了九篇论文，作者中分别在国立台湾大学和香港大学授隋唐史的傅乐成和罗香林先生先后作古；历任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的严耕望、出身新亚书院后来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孙国栋和长期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学的李树桐三先生亦相继脱离教研职务，但仍不时发表论著；其余罗香林先生高足、前任职香港大学、现任教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林天蔚先生专治宋史，毕业新亚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曾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现任职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曹仕邦先生精治佛教史，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毛汉光先生的研究范围，亦以六朝为起点，故目前单以隋唐五代为专业活跃史坛的，其实只有前任职香港大学、现任教台湾东吴大学的章群先生，由他们的经历和背景可以看到，本书作者主要是战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人，其中第一代多在战前在大陆受教育，而他们培育出来的第二代学者，亦多少承袭了他们的学风，换言之，如

果说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蓬勃时期，则遗风和影响，可说仍部分见于台港的学者中。

九篇论文的撰写年代分别从六十到八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专论极少，自然与时代背景有关。高等教育仍未发达，研究者数量极少，专门杂志亦如凤毛麟角，但情形至六十年代开始改观，随着社会的安定，大专教育的推广，研究者的数目和有关刊物亦相应增加，不过收入本书论文的杂志中亦有部份已经停刊，可见文化学术出版在现代商业社会立足不无一定困难，但不论殖民地的香港又或偏安一方的台湾，政治都少有卷入历史教研工作，历史教研，特别是多视为中古史的隋唐五代领域，并不易起直接服务社会的作用，历史工作者因此有相对的方便去从事本身的研究，在课题的选择上，研究者因此可说有颇大的自由，而一方面由于同行不多，研究同样对象的机会较少，大多数人亦下意识地去拓展新的领域，使所谓重复劳动的情形罕见，不过，由于研究者数目始终有限，能够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的机会并不多，彼此能够对话的场合亦罕见，故此，说他们在这片史学园地中默默耕耘并不为过。

本书所收论文，当然无法全面发表诸位先学的成就和治学特色，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傅乐成先生对隋唐的外族、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关心（见《汉唐史论集》自序），从《夷夏观念之演变》文可见一斑，林天蔚先生近年致力于地方史，特别是广东地区的研究，《隋谯国夫人事迹》一文，即是他早年在这方面大量搜罗地方史料所作出的成果，严耕望先生早年专治制度史，后来又精研隋唐地理，《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可算是两方面的结合，章群先生考察唐代外族问题多年，心得可见《唐代的安、康两姓》。毛汉光先生以掌握大量史料探讨六朝至唐代的士族见称，《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亦反映了这种特色。有多篇专论唐代中央官制文章的孙国栋先生，主要用统计

方法，但在《从〈梦游录〉看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中，改以小说去印证他的研究，罗香林先生是研究唐代景教和岭南文化的先驱者，《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蛻父子不祀祖等关系》即为其中一例，李树桐先生对唐初史事有独到见解，《唐人喜爱牡丹考》却反映了他治唐史的另外一面，而从《〈旧唐书〉立僧传之暗示作用》不难看出，曹仕邦先生是少数能够从史学角度去考察中国佛教的研究者。

如果这些论文有共通的地方的话，那大概是它们是立足于史料之上。不过硬要把他们定名为史料学派，恐怕亦未必适当。因为无可否认，是各文大多有本身立论，不纯是停留和满足于史料排列的考据；而目前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性质，仍然有不少需要细心整理功夫，始能提供大片的空白。各文的论点是否中肯，当然还得让时间考验和后人批评。但它们态度严谨，未有标榜任何学派，却不乏探索求真精神一点，实无容异议。有趣的一个现象自然是，台港两地虽然都是商业社会，史学工作者却少从经济史角度下手，反而较重视人文方面，与大陆地区的情形成为反对比。不必讳言，从今日看来，这些作品间中亦不无制约和缺点：新材料不易利用，实地考察难以进行，外国研究未能参考等，但考虑到时代限制，实在瑕不掩瑜。同时亦应注意的是，一些目前看来颇普遍及为不少人熟知的方法，例如计量史学，在本书所收的一些论文中的应用，在文章发表的年代，特别是在中古史领域中，其实是一种突破。事实上，尽管到今天，计量史学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虽然间中有人利用，但依然不一定十分成熟。

由于本书所收论文，重点在早年的学人论著，近年成果难免忽略。篇幅所限，这个任务只能日后再交代。史学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台、港史学亦难免例外，史学工作者肯定会同意，现在不可能与过去一刀截断。在这种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本书的

论文大概会有它们一定的价值。台湾和香港的史学研究在中国史学界，或只是一丝涓涓滴滴的支流，不过不应因此而忽视。实在相信和希望，本书不过是介绍台、港史学给大陆上同行，藉以彼此深入切磋交流的第一步。

黄约瑟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一九八九年九月

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 傅乐成 ·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置诸壑；朕见贤者敬之，不肖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文中所言五事，皆太宗自谓超迈前古之处。其实嘉善纳谏，大度包容，历代贤君，亦优为之。独于中华夷狄，兼爱如一，为前人所无。盖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之汉人，承异族累叶之政权，于所谓夷夏观念，本甚薄弱。故建国之后，虽四征不服，既服之后，则视如一国，不加猜防。唐初每定异族，即于其地置羁縻府州，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予以高度之自治权，甚至委异族

以中央要职，与汉人比肩于朝。贞观四年（630），太宗既平东突厥，其酋长任职中央，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此种华夷一家之盛况，诚空前未有之事也。

贞观十三年（639），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反，进犯九成宫。事平之后，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太宗遂以李思摩为可汗，率所部建牙于河北。其后思摩因受薛延陀之欺凌，又以不善抚御，其部落弃之，渡河而南，唐以胜夏二州处之。而思摩轻骑入朝，拜为右卫将军。由唐室之无阻突厥部众南渡，复不责思摩之擅离职守看来，可知太宗之夷夏观念，并不因结社率事件而有所改变也。

太宗死后，所谓华夷一家之观念及政策，仍为唐室所继续保持。高宗武后之世，异族将才之盛，不减贞观，如黑齿常之、李多祚、泉献诚、论弓仁等，皆其杰也。此种现象，愈演愈烈，至玄宗天宝，遂委异族以方面之任，沿边十节度，率为胡人矣。以异族出任方面，史书谓其议倡自李林甫，《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国家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陵、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言：“文人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使，自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安）禄山竟为乱阶故也。《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及《资治通鉴》二一六天宝六载所载均略同，惟通鉴更申论曰：“上悦其（按指李林甫）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威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玄宗之重任蕃将，实形势使然，非必全由李林甫专宠固位所致。林甫固属奸佞，而玄宗尚非昏愚，若林甫之言全无根据，玄宗亦不致悦而相从。文人怯当矢石，好树朋党，固历代通有之现象；而当时蕃将之骁勇善战，要亦不争之事实。自高宗武后起，盛行科举，重文章之选，进士科成为汉族士人竞趋之对象，往昔尚武之风，逐渐消失。而蕃人识字者少，仍以弓马为能事，且其部落率居边区，犷悍之风，依然保持。太宗时之汉人名将，至此泰半凋谢，而汉人既已沾染尚文之风，武将之缺，自不能不以蕃人充选。加以高宗末年以后，北则突厥、契丹，西则吐蕃，同时炽盛，给予唐室甚大之侵扰。太宗以降三十年四夷宾服之局，自此破坏。大战既起，唐室对于蕃将，倚仗更切。及至玄宗，锐意开边，于是益重用蕃将，渐至“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此种形势，实由唐室中央提倡文人政治，汉将人才缺乏而造成。安史之乱，乃此种形势自然演变之结果，岂一李林甫所得为力者哉！兹再引史书二节，以证吾论。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附《泉献诚传》：

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铃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新唐书》一一〇《泉献诚传》载献诚曰：“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天授元年则载献诚曰：“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又薛吐摩支，通鉴作薛咄摩，薛延陀人。）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载：

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

子弟为武官，父兄擢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可知武后之时，汉将之武技，已远逊蕃将。而玄宗天宝之际，内地重文轻武之风，已蔓延甚烈，与边区居人之勇武是尚，判然不同。中央与地方在精神文化上之对立，不待安史乱后，田承嗣、李怀仙辈之割据河北而业已完成。总之，唐朝前期，异族人才所以能在中国之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占有重要地位者，实有二因：一由唐人夷夏观念之薄弱，对异族不予猜防，因而能量才录用。二由科举制度之盛行，汉族才智之士，多以文章猎取功名，而御敌安边之事，乃不得不委诸蕃将。就整个唐朝前期之政治史观之，此实自然之趋势也。

此外尚有一事须注意者，即玄宗之时，唐室中央，虽已稍有重文轻武之迹象，然对异族，固仍保持初唐以来之传统观念。而异族文化之输入中国，反于此时至于极盛。盖自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之一百一十五年间，外族为唐所俘或降附唐室因而入居中国者，达一百七十万人以上，包括突厥、铁勒、高丽、吐蕃、党项、吐谷浑以及西域诸国之人。此外来华经商传教者，亦极众多。波斯、大食以及西域贾胡等，遍及广州、洪州、扬州诸地。而新罗及昆仑等种人，多为国人用为奴隶。由于异族之大量来华，异族文化亦随之输入，在中国境内自由发展。举凡音乐、歌舞、技艺、衣食，皆为唐人所普遍爱好。自开元末直至天宝末，风靡尤甚，贵族士女，莫不以胡化是尚。《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开元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

开元天宝，正海内承平之日，士女耽于安逸，风气流于奢靡。其时唐人所吸收之胡化，不出娱乐享受之范围，于胡人之勇武精神，反弃之若遗，安史之乱，所以能一举滔天者，正由唐人精神萎靡，贪于享受之故。而此种风气之造成，又与科举制度之过分膨胀，有其不可分割之关系也。

二

安史乱后，唐室对于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如不细心体察，即难知其真相。故历来史家，类皆强调唐人华夷一家之精神，以说明此段时间内国人民族思想之特色，然于此种观念之演变，则鲜有论及。实则有唐后期国人之民族思想，已较前期颇有不同，殊不应混为一谈也。

唐室之疏忌武人，始于安史乱时。宦官之所以能乘时揽权，出任监军，入统禁旅，朝廷唯其言是听者，亦即此种思想之具体表现。其后大难虽平，然河北、淄青诸地，犹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唐室既无力加以征服，不得已行姑息之政，视其地如化外，以致祸延后世，此点当于后节详论之。至于唐室中央对待其嫡系之将领，亦极尽猜防之能事，尤以异族将领为甚，此可以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之事迹为例。

李光弼，契丹人，为讨平安史之主将，再造唐室之元勋，与郭子仪齐名。其对于唐室之忠诚，实无可疑。而初因愤恨文臣之轻慢，擅杀御史崔众；继因与宦官程元振不协，拥兵不赴京师之难；复惧宦官鱼朝恩之害，致终身不敢入朝。然猜阻至此，必有其内在原因，未可以武人好犯上概之也。《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